

WEIMANZHOU GUO
JIAOYU SHI

WEIMANZHOU GUO JIAOYU SHI

WEIMANZHOU GUO JIAOYU SHI

刘兆伟
许桂清
主编

伪满洲国教育史

WEIMANZHOU GUO JIAOYU SHI WEIMANZHOU GUO JIAOYU SHI

辽宁

©刘兆伟 许桂清 2003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伪满洲国教育史/刘兆伟 许桂清主编. — 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2003.10

ISBN 7—5610—4549—2

I. 伪… II. 刘… 许… III. 伪满洲国(1932)—教育史
IV.G529.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87684 号

责任编辑:刘东杰

版式设计:赵 伟

封面设计:刘 洋

责任校对:齐 月

辽 宁 大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地址:沈阳市皇姑区崇山中路 66 号 邮编:110036

联系电话:024—86864613 <http://www.lnupress.com.cn>

Email:mailer@lnupress.com.cn

辽宁教育学院印刷厂印刷 辽宁大学出版社发行

开本:880mm×1230mm 1/32 印张:13.125

字 数: 320 千字

2003 年 10 月第 1 版

2003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 000

定价: 22.80 元

正确认识伪满洲国教育史

（代序）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中国东北地区，1932年成立傀儡政权——伪满洲国，直到1945年光复，伪满洲国教育一直控制在日本手中。伪满洲国教育是中国现代教育史中极为典型的殖民地教育。研究这段教育史，掌握殖民地教育之本质，从中可窥见日本帝国主义怎样运用教育这一手段而为法西斯侵略战争服务的真相，进而揭露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东北犯下的滔天罪行，以古鉴今，借史育人。

一、伪满洲国教育的本质

任何社会的教育，都是为当时的政治、经济服务的。伪满洲国的政治、经济，当然是殖民地的政治、经济，而这种政治、经济所决定的教育必然是殖民地教育。日本一方面通过伪满洲国教育培养它所需要的统治东北的人才，以维护和巩固其殖民经济；另一方面通过伪满洲国教育向东北人民，特别是向青少年进行奴化教育，以培养既能为其创造财富的奴隶，又能听从于它统治的顺民。所以，伪满洲国教育的本质即为明火执仗的奴化教育。

（一）在精神上塑造亲日国民

以精神教育为核心，将德育放在至关重要的位置上，推行奴化教育。伪满洲国民生部教育司长皆川丰治在阐述德、智、体三者关系时，强调指出：“不论知识怎样丰富和身体怎样强健，如果缺乏

精神教育，则毫无意义，相反，还会毒害国家社会”^①。其所谓毒害国家社会，即东北人民觉醒后要推翻伪政权，驱除日寇，还我“白山黑水”。于是日本侵略者就加紧对东北人民进行精神侵略，以麻痹东北人民。这种精神教育主要体现在教育宗旨、教育内容、教育方法（日常管理）、学校领导等方面。

1. 教育宗旨

“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侵略者对其教育宗旨进行了修改，尽量删掉了像“守其土，治其民”，“兴办学校，教育百姓”，“讲授日语，习之以日语”之类带有军事专制性的民族歧视色彩的词句。其目的无非是麻痹中国人，使之更容易接受殖民教育思想。

1933年，伪满洲国政府提出：“今我国家（伪满洲国），以王道为施行教育的方针，……以道德仁义培养国民之高尚品格，……使内而重仁义，尚礼让，……外而亲仁善邻，无诈无虞。守国际信义，谋民族协和，……而巩固坚定之国势亦易树立”。伪满洲国教育宗旨还提出要教育人民“无诈无虞”，就是要训化东北人民除去民族自尊心、民族责任感。如果有反抗思想、有中国人的觉悟、有“逐日寇，复东北”的思想与行动，那便是“诈虞”。1937年，在“新学制”中又进一步强调：“遵照建国精神及访日宣诏之趣旨，以咸使体会日满一德一心不可分之关系及民族协和之精神，阐明东方道德，尤致意于忠孝之大义，涵养旺盛之国民精神，陶冶德性，并置重于国民生活安定上所必需之实学，授与知识技能，更图保护身体之健康，养成忠良之国民”。1940年，溥仪第二次访日归后，在《国本奠定诏书》中指出：“我国之教育本旨，奉体国本奠定诏书之趣旨，彻底于诏书所示之惟神之道，涵养振作忠孝仁爱、协和奉公之精神，训育忠良之国民，更使练成之”。这里所说的“王道”就是日本帝国的“皇道”，所谓的“建国精神”就是把东北割裂出

^① [日]皆川丰治：《满洲国之教育》1938年版，第16页。

去，成立伪满洲国。为向东北人民灌输尊崇天皇、效忠日本、服从傀儡之思想。1941年溥仪在《时局诏书》中进一步强调：“朕与日本天皇陛下精神如一体，尔众侪与其臣民咸有一德一心，夙将不可分离关系”。日本侵略者以日满亲善、日满一家、日满一心一德、傀儡溥仪与日本天皇“精神如一体”、两国同为东方文化等为障眼法，向东北人民灌输日本占领东北地区是“天经地义的道理”，要东北人从思想上认识到这一点，而后成为忠诚日本天皇的训良国民。这就是其教育本质。这一点是铁证如山，万世不可更易的事实。

2. 教育内容

1932年，伪满洲国刚刚建立，羽翼未丰，即着手编写奴化教育课本。伪满洲国上层统治者秉承其主子日本帝国主义的旨令，于其中设法体现“建国精神”，培养“忠良国民之信念”，达到“日满一心”之宗旨。凡有与上述内容相背的教科书、教材，一律废止；带有民主、爱国之意的书籍，统统取缔。据不完全统计，仅1932年3月至7月，凡是反映中华民族奋斗图强的书，反映东北人民有民族感的书，反映抗日、革命的书，只要被他们发现即行烧毁，总共烧毁的图书达650万册。并规定：从1936年起，中小学教科书必须采用“国定教科书”、“审定教科书”。即充斥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东北是日满亲善、日满一心等反动内容的教科书，这是打着伪满洲国印迹的、日本帝国主义所认可的教科书。其主要授业目的在于：进行伪满洲国“国民”意识、忠君报国教育；进行敬神（日本天照大神）亲日教育，即“日满一体”、“同文同种”、“共存共荣”、“日满一德一心”教育；进行法西斯惟命是从、忠于帝国的“棍棒教育”；进行挫败日本对立势力的“仇恨”教育。

一般的殖民地学校正常开设外语，本为常事，但日语却与一般外语地位迥然不同。伪满洲国政府把日语作为“国语”而加以推行。1937年以前，“汉语”是其国语。1938年实行“新学制”后，把“汉

语”改成“满语”，并强化日语，在1937年5月颁布的“学校教育要纲”中规定：任何学校都必须把日语列为必修的国语科之一，以使将来以日语为伪满洲国的共同语言。为达到这个目的，伪满洲国采取了以下措施：（1）增加日语学时。自1938年起，小学一年级就开设日语。中学日语课时量是以前的两倍。（2）优化学习日语的政策。如日语检定制度化，经考试日语合格，发给“语学津贴”。以“加分法”鼓励学生用日语答卷。（3）日语口语化。从1941年始，要求学校生活用语全部日语化。为进行“国民精神”熏陶，除此还增设了“国民道德”、“历史”等课程。“国民道德”课程，“专讲伪满建国之由来，及日本之国体、政体、日满一德一心，日满亲善等，尽量麻痹学生思想，混淆民族意识，以达成对日本帝国主义服从之目的”。“历史”课是“讲日本史及‘满洲建国史’，内容虚构歪曲，妄使学生不知祖国历史，一心一意为日寇服务”。^①

日本帝国主义深知要全面的影响化育东北人民，就必须使东北人民学好日本语，民族之间的影响关键是语言相通。语言相通后，便于联络感情，进行思想感化，以售其奸。日本语教育本身就是以日本进步的生产技术夹杂着侵略者的罪恶思想向东北人民日熏月陶，风吹雨化，久而久之，定有变化。其实质用心昭彰如火。

3. 教育方法（日常管理）

这与旨在灌输奴化思想的教育宗旨、教育内容相辅相成。其主要体现于日常训练上。在《奉天市学校学生思想善导方案》中讲，具体训练方法有三：“（1）团体训练。校长率同教职员每周集全体学生于礼堂开会一次；各级任教职员在本级每周训话一次；修身、经学教员在授课时，就课本内忠、孝、礼、义等等大节指示实施之方法。（2）个人训练。在课余之际，任教职员与学生因事务接触，时

^① 辽宁教育史志编纂委员会：《辽宁教育史志资料》第3集，辽宁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630页。

常施以谈话式之训练，使其思想纯正，勿入歧途。(3)特殊训练。由他校转来的学生，良莠不齐，必先施以特别训练，以期同归于正；学生运动之时，易生粗暴行动、无礼言笑，尤宜施以矫正之训练；少年闲居，易为不善，当规定课外作业，使之有事可作，思想不暇外骛”。^①

这三种训练，贯穿于学生日常全部生活。具体内容是：(1)每日必背“回銮训民诏书”、“国本奠定诏书”、“国民训”等这些体现“建国精神”的“经典”。有的省还自定“教育训”，供学生天天读背。如吉林省“教育训”为：“一、吾等恭谨敬拜天照大神，二、吾等尽忠于皇帝陛下，三、吾等行孝道于父母，四、吾等以日本为中心努力于一德一心，五、吾等努力炼成勤劳”。(2)实行“式日”制度。即在节日或认为是重要的日子，必举行固定的仪式。“式日”一年大约有20余次，每一次都要按照固定程序举行典礼。在典礼中，强迫学生向“御影”敬礼、向“帝官”遥拜，诵唱伪国歌、日本国歌。这实质是一种奴化思想的综合训练。(3)进行各种礼仪训练。每日“朝礼”、“终礼”，出入校门要向“建国神庙”或“建国忠灵塔”(日本阵亡将士之墓)敬礼；睡前要反省一天所为，礼毕才能入寝；为制造矛盾，增加同族仇恨，规定：低年经学生无论在什么地方，凡见到高年级学生都要敬礼或鞠躬，否则要遭毒打。奴化教育的罪恶用心再清楚不过了，教育中国学生要拜日本天照大神，举行典礼要向日本天皇像和傀儡 溥仪像敬礼。此即通过种种形式妄使中国人忘记自己的民俗，忘记自己的传统，由灵魂深处、由骨髓里流淌出日本帝国主义的思想情感。

4. 学校领导

为便于对学校进行控制，伪满洲国政府在校特别安置日系副

① 辽宁教育史志编纂委员会：《辽宁教育史志资料》第3集，辽宁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4—25页。

校长,把持学校实权,极力强调校长在学校中的作用。中国教员由日本人决定是否聘用。伪康德四年(1937年)奉天省第一次中学校长会议明确指出:“校长为学校中心人物”,“校长对全校统制事项,要常加反省,究查得失”,“校长对学校行政事务不仅应内外并重,至于教学、训管诸项更不应次于行政事务,保证兼顾周密”,“校长要对教职员亲切监督指导”。为达到全面控制教育,在《国民高等学校令》中明令规定各国民高等学校一律备置:关系法规;学校沿革志、学校一览表及视察簿;学则、日志;学生之学籍簿、出席簿;教职员名簿、履历书、出勤簿以及学校总务后勤方面的完整资料20余种。并对各种档案资料的保存时间作了统一规定。

(二) 在劳动中训化浅识奴隶

日本图谋长期统治东北人民,害怕人民自立,于是便压低其教育水平,只求达到会做工的程度。主要体现在教育方针、“新学制”、专业设置上。

1. 教育方针

东北沦陷后,日本便指出了“训练学生,陶冶品格,普及建国鸿旨,实行王道教化,注重实际生活,锻炼劳动习惯,养成自治志操,不尚空论”的教育方针。1937年在《学制要纲》中又提出:“置重于国民生活安定上所必须之实学,授之知识技能……”其主要目的,是在东北培养为日本服务的、会劳作的中国奴隶。于是伪满洲国大肆发展职业教育,快速地大量地培养技术工人,以满足日满反动政权的需要。

2. “新学制”

降低东北青少年受教育的程度,是伪满政府对东北人民实施奴化教育、培养“第二等臣民”的主要意图。突出表现在1937年伪满政府颁布的“新学制”上。主要为:一是缩短学制。日本实行小学、中学、高中、大学6、5、3、3制,而在伪满实行的却是小学、中学、大学6、4、3制,程度相差4年之多。二是减少授课日数。

小学减到每学年 33 周，中学减少到每学年 30 周。三是减少文化课时。1937 年以前，中学文化课占总学时的 90%，1938 年后降到 40%。以上数字充分暴露“新学制”之反动实质：是日本殖民者在东北推行愚民政策的集中体现；是奴役东北人民，进行军事侵略、经济掠夺的工具；是殖民地奴化政策在教育领域的高度强化。

3. 专业设置

1937 年前，在创办初、高级普通中学的同时，职业学校、实业学校也相继成立。职业学校学制三年，主要是工、农、商、医各学科。实业学校分初级、高级两种，学制各为三年，主要有工、农、商、林、水产等学科。1938 年后，除了增设职业学校外，把所有普通中学均改办成职业性质的国民高等学校，当时，普通中学全然消失。

日本帝国主义的目的不外乎妄图通过控制东北地区教育，以利奴化思想顺利推行而已。欲把东北完全变成脱离中国的日本附属国，向日本俯首贴耳，使东北人民变成站在日本侵略者思想立场上的奴仆。

二、伪满洲国的儒佛教育手段

日本帝国主义看到中国传统文化以儒家伦理为核心这一特点，于是日本侵略者便以东北人民容易接受的中华民族传统的伦理道德包裹着它们所搞的奴化教育的道德宗旨，对东北人民进行所谓的仁义道德教育。同时，日本帝国主义又借佛教兜售其奸。

（一）竭力以儒术掩其恶、售其奸

伪满洲国尤钟儒术，妄图以儒术安定巩固其罪恶统治。一是因为儒家思想为中国历代封建王朝所必需，无论何朝何代何民族的统治者，欲巩固统治，必须施行儒道治国安民，内奸外寇深深认为，伪满洲国亦不例外。二是因为日本国有注重儒术的渊源，日本帝国主义对儒道变方运用非常娴熟。当然，在东北地区施行的儒术是按

侵略者逻辑改造后的儒术，只强调“温良恭俭让”、驯良笃诚，以使东北人民习惯于、适应于奴化统治。而不谈儒家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民族气节，更不去宣扬中华民族的“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脊梁思想。专讲日满亲善，至仁至爱；“满洲”人要有涵养，要有包容精神，要忍让；不要排斥日本侵略者，要“共存共荣”等等。以此掩盖其侵略罪恶，兜售其削弱东北民族意识的方略，妄图永远霸占东北地区。

1. 通过学校教育法令、方针的制定，有计划地宣传扭曲了的儒家思想

日本帝国主义从 1895 年甲午海战后，对中国东北步步进逼，1905 年开始霸占辽东半岛及东北重要的铁路沿线地区。1931 年 9 月 18 日开始占领东北全境。在与东北人民较量的过程中，认识到只靠杀戮是站不住脚的，必须辅以欺骗的说教。而中国人民历来注重孔孟仁爱忠孝的学说，于是日本侵略者所炮制的傀儡政权——伪满洲国在教育方针、学校教育法令政策的制定等方面，有计划地宣传被他们阉割后的儒家思想。

伪满洲国建立不久，即对儒家思想加倍崇祀。其文教大臣许汝棻指示说：“我国尊崇王道，仁义是资，此后自当恭体执政宣言，以道德仁爱为主，除去种族之见，国际之争，以王道修齐治平之旨，内以树立我国民族精神，外以协和世界人民情感，此本部教育之方针也。”“国之大事在祭与戎，比年以来，祀典废坠，孔子庙庭，行且鞠为茂草矣。去年仲秋丁祭，本部通令各省县，一体举行。嗣后每适春秋丁祭，中央及全国，咸敬谨行事。”^①伪满洲国的内奸外寇妄图以此装潢掩饰铁蹄践踏东北三千万生灵的血腥气息，口诵贤圣之书，满口仁义道德，即可诱骗东北人民以敌为友了。但“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① “满洲国”《文教月刊》第 3 号，伪大同 2 年 8 月。

伪满洲国教育法令讲：“满洲国以王道主义立国，其理想之国家，综言之，则为平天下，分言之，则为富国安民乐业。教育建设之理想，应与国家建设的理想相表里。故满洲国之理想教育，应以平天下、富国、安民、乐业，为唯一建设之标准。换言之，即应以满洲国建国宣言为教育建设之标准。……实现上述教育建设之理想方法，要不外因时因地因人以制其宜。”^①“王道”一词本义是以宽和仁爱思想治理国家的正道。“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党无偏，王道平平；无反无侧，王道正直。”^②“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③汉刘向评论王道说：“王道如砥，本乎人情，出乎礼义。”^④“乐土”一词本义是“有道之国”，引伸为理想的生活环境。“硕鼠硕鼠，无食我黍。三岁贯汝，莫我肯顾。逝将去汝，适彼乐土。乐土乐土，爰得我所。”^⑤中国历代人民多拥护“王道”，追求“乐土”。所以伪满洲国不但在政治上打出“王道乐土”的旗号，在教育上也完全以儒家的语汇，诸如“平天下、富国、安民、乐业”去宣传他们的教育方针。逐渐地将侵略者与被侵略者“本为一家”的思想、将侵略解释为帮助建国与传播新文明的思想灌输给东北人民，以期达到巩固伪满洲国统治、使东北人民与强盗“共存共荣”的目的。

但伪满洲国唯恐东北人民觉醒，极力以儒家思想抵制革命思想。“我满洲国以王道立国。今建设未久，王道真谛，民众多未明了。故宣传王道，以求贯彻建国本旨，乃不容稍缓之事。民国成立以后，邪说横行，浸及关外，礼教不讲，风俗毁坏，作奸犯科，悖伦乱理之事，时有所闻。我满洲国既以王道立国，即宜讲求礼教。必须明礼习让，始可作为满洲国之国民。”^⑥由此不难看出，伪满洲

① 《满洲国文化教育年鉴》（1933年），第304页。

② 《尚书·洪范》篇。

③ 《孟子·梁惠王》上篇。

④ ⑤ 《诗经·魏风》。

⑥ 《满洲国文化教育年鉴》（1933年），第306—307页。

国宣传礼教、王道，其本质目的就是愚民，抑制东北人民吸纳革命思想、民主思想。他们把推翻封建统治后的民主风气说成“风俗毁坏，作奸犯科，悖伦乱理”，把革命思想、革命学说的传播说成是“邪说横行”等等。难道伪满洲国真的要恢复儒家道统，对人民施行仁义道德吗？不是，而是用儒家思想这个外壳去推行日本帝国主义的强盗之术。

2. 通过精心炮制的教育内容，向学生灌输变型了的儒家思想
伪满洲国一再强调教育、宣传“务合王道，以提倡忠孝节义之关于旧道德者为标准。并查禁不良戏剧书曲，以端风尚。他如关于王道精神，或新教育之宣传，不防利用电影图书文字等。”^①这其中有一点值得特别注意，伪满洲国大力提倡王道、忠孝节义的同时，又提出一个“新教育”，并明确指出，可以通过电影图书文字去进行。这就揭示了问题的实质，大倡儒家思想是虚表，进行“新教育”是根本。其所谓新教育，就是日本帝国主义的奴化教育。所以伪满洲国所宣传的儒家思想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儒家思想，而是在外寇内奸通同作弊的情况下被扭曲了其真谛的儒家思想。这可以由 1933 年出版的《满洲国文化教育年鉴·学校教育总说》中的几句话证明：“今我满洲建国，实行王道教育，重建乐土乐郊，所有一切设施，自不能不力反前辙，别标正鹄。”此节文字极其鲜明地道出了对中国原有的旧制度（包括以儒治教）都要“力反前辙”，而标新立异。这个“新”、这个“异”，就是日本帝国主义真正想搞的殖民教育、奴化教育。但是，如果赤裸裸地讲其奴化教育的合理性，是不会使人接受的。于是在大颂中华民族传统道德的烟幕下去推行其侵略思想，就易于得逞。再接看引文即可不言自喻：“所谓新的设施者何？即实行王道教育之具体方针是也。我满洲建国，既以王道为极则，则教育方针，亦应以是为正鹄。……王道精神，首重博爱。所谓种

① 《满洲国文化教育年鉴》（1933 年），第 306—307 页。

集中地反映了日满以儒术之名行奴化教育之实。比如,小学《满洲国语课本》第八册第一课讲:“我满洲国建设的主旨,是顺天安民,想要使它实现,这才实行王道主义。王道主义原是把仁义和礼让做根本的治世之道”,“古时尧、舜、禹、汤、文武、周公都用王道治国,天下太平,称为盛世,这不是最好的证明吗?现在我们满洲国实行王道主义,在国内听从民意,施行善政,使人民自给自足,安居乐业。居住国内的人,一切不存在种族歧视,共行协同的生活。至于国际间的信义,各都恪守,致力和平,敦睦友好。像这样实行王道主义,建国的主旨,自然实现。这个满洲岂不是我们理想中的王道乐土吗?”由此伪满洲国教科书的内容足以证实了伪满洲国玩弄孔孟之道,用尽了中华民族传统政治、教化中的美好的、有感召力的词语,诸如“顺天安民”、“天下太平”、“盛世”、“听从民意,施行善政”、“安居乐业”、“敦睦友好”、“王道乐土”。这些词语内容表面上看,都是中华民族苦苦求索两千年的理想社会思想,但伪满洲国用其于此,涵义迥然不同了。而是以此诱导东北人民服从其统治,安适其摆布,使东北人民消尽反抗日本侵略者的思想意识,以至乐于做奴隶,使伪满洲国、“长治久安”下去,使日本永远占有东北的一切。这便是伪满洲国大倡儒术的真实目的。

3. 通过“道德会”的社会教育向民众传输走样的儒家思想

伪满洲国非常注重社会教育,当局认为欲使全体国民养成“忠良驯服”之国民,只靠学校教育是远远不够的,必须注重社会教化作用。伪满洲国为使社会教化与学校的儒家思想教育很好地配合,1933年指使其僚属首先在新京(长春)成立伪满洲国万国道德会总会。万国道德会的宗旨是尊孔读经,宣传礼教,忍让谦和,“改进社会,促进大同”。教化人民唯命是从,忠于伪满洲国,做驯良的国民。如:吉林省伊通县万国道德会明确指出:以“忠孝诚敬、慈爱信义诸德目为主,使社会一般人民皆有避恶向善之心为宗旨。”1936年改名为满洲帝国道德会,明确规定其宗旨是“研究性命,实

行道德。”由于日伪当局以为这个由上而下的“道德”组织，可以形成一个网络，把伪满洲国所有臣民都纳入其教化之中。这样就易于施以日本帝国主义的阴谋计划。所以伪满洲国非常重视“道德会”的作用。其鼎盛时期，在长春设有总会、三处总分会，市县分会208处，乡镇分会529处。在各级道德会领导下成立了怀少园144处，民众讲习所650处，访问团45个，会计讲习班12处，节孝讲习所20处，幼师讲习班17处，保母讲习班12处，私立小学400所。

“道德会”的会员都要遵守五戒、十信条。五戒是戒不良嗜好、特殊禀性、虚妄言语、矫伪行为、违离信仰；十信条是节饮食、慎起居、励精勤、尚节俭、尽职能、笃伦常、守法律、兴公益、尊圣哲、助会务。这其中关键的是何谓“虚妄言语、矫伪行为、违离信仰？”伪满洲国把反满抗日的语言叫做“虚妄言语”，把维护中华民族尊严的行为叫做“矫伪行为”，把鄙弃日伪说教称为“违离信仰”。“道德会”的会员每天早上要“清性”，即这一天如何做个地道的顺民；每天晚上要“归命”，反省自己一天的行为是否合乎“顺民”的要求。显然，就修养形式上都是中华民族传统的修养方法的再现与再造，但形式之中的内涵大大被其阉割与移植，完全换上了维护伪满洲国统治的内容。

“道德会”在整个东北地区的网络束缚了一部分人的抗日思想，是伪满洲国较为“成功”的社会教育手段。

（二）精心以佛教饰其善、布其教

伪满洲国大倡儒家思想的同时，大倡佛教，妄图以此粉饰其政治，故作普度众生之态，极力配合“共存共荣”、“王道乐土”的欺诈口号。所以伪满洲国一直重视佛教的作用。1933年出版的《满洲国文教年鉴·宗教总说》就充分体现了这一点。“世之用以维系人心者，有三：曰宗教、曰道德、曰法律。宗教者，所以济法律之穷，而补其不足也。”“人不可无遵守，不可无希望。无遵守则放僻邪侈无所不为，无希望则如槁木死灰，坐以待毙。宗教者，即所以使人

有所遵守有所希望也。平凡之人则遵守信条，希望天国；非常之人，则遵守教义，信仰主义。其所遵守与信仰虽不同，而其趋于为善则一致也。……盖世人果皆受高深之教育，具高尚之道德，则束缚其身者，只用良心，不须其他。惟是今世人民之程度，似犹未至也。苟不用宗教以范之，则其危险之钜，将如洪水泛滥，溃决横流，不可制止。其不敢为恶者，非心惮于法律，乃恐神灵之暗察也。因其平昔常存祸福之念，故其行为或能稍知谨恪。今世人心之所以大坏者，未始非道德之废弛，而又无宗教以补救有以致之也。”日伪当局认为治理巩固其伪政权需要佛教作辅助力量，要充分利用佛教的特殊功能，使东北人民各个自我向内约束，做伪满洲国的“良民”，对国土沦陷无动于衷，无视侵略者横行东北地区。这才是日伪提倡佛教的真正目的。

1. 日伪利用东北原有佛教理论的实施

1931年11月，即“九·一八”事变不久，自治指导部向东北人民发布了第一号布告说：“不问为何籍居民，须焕发大慈大悲之胸襟”，“且于此大乘根性无比之地域，倾注全力，创设历史上未有之理想乐土。”佛教的推行目的于此再现端倪，即占领者与被占领者均须以慈悲为怀，宽宏地对待对方。而后，在这大乘佛教思想影响深远的地域（东北地区），创造一个从未有过的理想殖民地。

于是日伪大肆鼓吹修寺信佛，到了伪满末期，东北地区有佛寺2 000余座，僧人4 200余人，信徒有560多万。日伪还积极培植亲日佛教团体，这些团体完全将佛教作为亲日的宣传教化工具。如吉林省九台县世界大同佛教会的教旨是：以净土宗为主，兼修其他一切宗教，依靠佛的无所不能的力量，既有利于自己与他人，又能自悟并开化他人；依靠宗教的力量，满洲的民心得信念上的净化，以利于实施国家政策；以慈悲为怀，将会员的捐赠用于救济贫民的事业，以辅助王道政治的德意。其会则是：会员必须修身养性，保护日满不可分的关系，以求共存共荣。而凡是不向日伪当局表示维

护“日满亲善”的佛教团体或寺院则全被日本军警横加罪名而解散。所以，存在下来的佛教团体多数是按日伪统治思想行事的。

东北的喇嘛教寺院、喇嘛信徒绝大多数分布于内蒙的呼伦贝尔盟、兴安盟、哲里木盟、昭乌达盟。据 1933 年统计，东北地区喇嘛庙有 214 座，喇嘛 8 680 人，日伪大肆利用喇嘛教统治蒙族人民的思想。日伪政权先后选派 20 余名年轻喇嘛到日本高野山、京都知恩院留学。预想其回国后，完全按日本帝国主义的意图去教化蒙族人民，稳定蒙民地区，使之接受日伪统治。

2. 以日式佛教制约东北佛教

1934 年，日本比睿山派来的天台宗和尚到哈尔滨慰问日本侵略军，并提议成立旨在实现“日满亲善”的佛教总会，创办佛学学校。日伪当局采纳了他们的阴谋，即刻以日伪政权显要为首成立了佛教总会与佛学学校，培养为日本殖民统治服务的和尚。佛学学校的学员普遍学日语，毕业后到各地传教，从此之后，哈尔滨地区及东北北半部的佛教传教活动都在日本佛教的影响制约之下了。

日本延力寺和尚一番瀨顺证是总寺院派遣到东北的第一个开山法师。1935 年 3 月到长春，住进护国般若寺，掌握伪满佛教教权。通过佛教总会掌握信仰佛教的上层绅士的思想动态以至一般人们的思想情绪。

日伪当局组织东北当地和尚到日本寺院去学习、参观、访问，使之受到日本殖民主义思想的影响。上文提及的蒙族喇嘛教，其中有些喇嘛就被派往日本留学，回到蒙族地区后，就容易宣传“日满亲善”的合理性、必要性。这就达到了日伪政权利用佛教的目的。

日伪政权利用儒佛巩固其统治，自然扭转不了它失败的定局。因为他们的目的是非正义的、是侵略的、是破坏和平的。侵略与被侵略的两个国家，其根本矛盾是不能用儒佛来调停的。但日伪利用儒佛也起到了暂时缓解矛盾的作用。因为中国东北民众信仰、推崇孔子所讲的道德、做人处事的标准。孔子是中国的圣人，他的学说

族观念、排外思想，务使根本铲除，不遗丝毫芥蒂。以期民族与国际间之协调，而树人类相爱之基础。孔子所谓，‘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即此意也。”《学校教育·总说》用了大量文字阐述中华民族传统礼教仁爱之重要，为今日学生修养之不可缺云云。然而，行文之后半部就公然挖掉儒家思想的精华，而塞入奴化教育思想。要中国学生加强道德修养，做到“博爱”，博爱到爱日本侵略者的程度，与强盗共存共荣，要摒弃反侵略思想，并且要斩草除根。说什么，这样才能“树人类相爱之基础”。明目张胆地扭曲孔子“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仁爱思想，把他们的强盗逻辑横加在孔子思想中，说是合乎孔子思想的，用孔子思想的标牌去兜售其反动思想。

《学校教育·总说》更有甚者公然反对爱国主义。“现在世界各国，其教育宗旨，不曰爱国主义，即曰军国主义。夫爱国主义，即反对外人之对象；军国主义，即为预备战争之先声。推其极，势必破坏治安，残贼人类不止。今我国家以王道为施行教育之方针，以爱国与军国民等主义为鉴戒；以道德仁义，培养国民之高尚品格；以劳作勤苦，训练国民之生活能力。使内而重仁义，尚礼让，务实去伪，崇俭戒奢；外而礼仁善邻，无诈无虞，守国际信义，谋民族协和。……而坚定之国势，亦易于树立。”口唱儒家仁义、礼让，而实质是要削尽中国东北人民爱国主义的思想。真是明白之至了，通过伪满洲国的“王道主义”的教育方针的实施，欲使东北人民忘记祖国、失去民族观念，而使其追求“亲仁善邻，无诈无虞，守国际信义，谋民族协和”。换言之，要对日本侵略者讲仁爱亲善，对其要忠诚无二心；要守亡国奴的信义；要接受侵略，熄灭反抗意识；要与侵略者和平共处。由此可见，伪满洲国的政治、道德教育内容对东北人民来说何其毒也！

1932年4月，伪满洲国直截了当地宣布“各学校课程，着暂用四书、孝经讲授，以崇礼教。”1933年编写的《国立教科书》则较